

---

January 2016

## Deconstructing Utopian Imagination: The Allegory of Solaris and Others

Da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Dan. 2016. "Deconstructing Utopian Imagination: The Allegory of Solaris and Other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112-11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乌托邦想象的解构:索拉里斯星寓言及其他

陈 丹

**摘要:**乌托邦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如何想象乌托邦”实际上就是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如何被书写出来”的问题。《索拉里斯星》采取了一种“双重书写”的形式策略,其结果是将乌托邦体裁本身的局限性转化为讽喻性和批判性,使得我们能够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总体性系统的内部对其进行驳斥,阐释由此转入政治伦理学领域。同时文本表面的那种主体性与他性的对立建构也完全失效,莱姆的怀疑主义实现了对乌托邦想象力的解构,证明了即便是对一种最低限度需求的“零度乌托邦”的想象,也无法逃离意识形态的现实力场。

**关键词:**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 《索拉里斯星》; 寓言结构; 解构

**作者简介:**陈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文艺学专业,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电子邮箱:Sammie2015@126.com

**Title:** Deconstructing Utopian Imagination: The Allegory of Solaris and Others

**Abstract:** Utopia is a socio-economic sub-genre of science ficti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magine autopia is actually an issue of how to write out the image of a utopia. In Stanislaw Lem's *Solaris*, there is a formal strategy of "double inscription," which turns the limitation of utopian genre into allegory and critical merits. Thus, it is possible to refute it from the inside of its anthropocentric totality and to divert the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thics. As a result, the surfac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is nullified,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 zero-degree Utopia, with minimum requirements, falls prey to the practical power field of ideology.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Stanislaw Lem's skepticism deconstructs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Keywords:** archaeology of the future; Utopia; *Solaris*; the structure of allegory; deconstruction

**Author:** Chen Dan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ry theory. Email: Sammie2015@126.com

乌托邦想象首先是对一种根本的差异性的想象,如想象一个全新世界的整体轮廓和构成方式,或全新的生命形式和伦理新变等。在这层意义上,科幻小说对种种“未来”的可能形式的探讨,与对想象其他世界的本质和可能性的古老哲学思考是一脉相承的。<sup>①</sup>绝大多数科幻小说都企图建构一种乌托邦蓝图,尝试以巨细靡遗的方式来讨论与当下生活具有拟换性关系的未来世界,特别是新社会新制度的建设计划及其优越性或反面性。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太空歌剧”流派还是“反

乌托邦”科幻系列,都企图将多种乌托邦要素拼贴组合进入一个共时性的未来里面。在此文本集合中,根本性的差异被细分为新的城市轮廓、新的体制、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形态和新的伦理规则等诸多子集,及其之间互相包含或相对独立的复杂关系,从而获得一种与当下生活旗鼓相当的系统性和总体性来保证乌托邦想象的有效实施。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sup>②</sup>在此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性。它采取了一种最经济的“零度乌托邦”的想象形式,这里有效的乌托邦要

素只有两个:索拉里斯星与大洋,而大洋作为唯一的可变量,所提供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可能形态,它制造了代言人海若等“F形体”与人类进行沟通,从而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这个变量本身又是乌托邦想象的极富悖论性的象征,它既承载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如永葆青春等,指向人类对未来身体或是极端他性的哲学漫思,但又表现为欲望的丧失,例如将大洋定位为一种无目的性的纯粹的存在;最可怕的是当科学家们面对这一梦想成真的现实时,理性堡垒却瞬间坍塌了,这无疑又进一步瓦解了乌托邦想象的世界,从而将批判矛头反向回转指向了其自身。综合这两种特殊性,选择《索拉里斯星》作为原初形态的乌托邦标本无疑是最恰切的。

## 一、乌托邦叙事及其矛盾

### 1. “垂直叙事”的魔法

从横向上看,《索拉里斯星》的基本叙事线索大致上是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线性叙事。简单而言,故事说的就是主人公凯尔文为了解开同伴的死亡之谜,在太空站内进行调查、实验并最终找到真相的曲折过程。但这种横向叙事所铺陈的一系列事件,只是在水平维度上构成了小说的主题材料。在这个基础上,贯穿全篇的索拉里斯星研究史料竖立起了一种垂直带结构:小说回顾了地球人类对索拉里斯星球近百年的研究历史,刚开始是科学实证式的探索,这些研究成果返回地球引起了各行各业的热议,人们“做”出了一套又一套的“科学解释”,企图要使得索拉里斯星的一切在自己生活的领域之内变得可理解。这个历时叙事被嵌入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在技术上改造了通俗小说的体裁形态。

然而,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小说如何叙事,即我们不关注文本的情节内容通过什么形式被串联起来,而是要发现这种形式对文本叙事构成的特殊作用——它将文献学式的历时性叙事放置在太空站图书馆这样一个封闭空间中,导致了时间悖论——这恰是乌托邦体裁研究的起点。具体而言,如果说整个索拉里斯星研究史在科学演进意义上等同于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那么这个图书馆最根本职能就是把带状结构的人类未来历史置入一个共时性的空间点。这个概念类似于博物

馆,它将地球的未来记录为某种过去,主人公对现有史料的阅读就变成了对我们未来遗迹的考古。这无疑是一种先兆式的考古,它所具有的时间悖论存在于一种颠倒中(詹姆逊,“未来考古学”137)。通过这种隐藏在叙事形式里的魔术手法,小说将整个反思视角颠倒,消除了我们认知中的套板效应,使我们能够站在未来对现实进行考古,从而与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拉开了距离,实现了布莱希特意义上的疏离作用。这种排山倒海式的叙事堆积在这里凸显了它在形式上的遮蔽功能:看似按照某种自然规律不断发展并无穷趋近真理的科学史,本质上不过是为了消除这种文化形成的人为痕迹及其本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已。其破绽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组自相矛盾的叙事元素。

### 2. 几组互相矛盾的叙事元素

首先是行为与意图之间的矛盾。人类自觉地将一个与自身具有绝对差异性的大洋作为他者进行科学研究,是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自信和理性崇拜的一种延伸性想象。但与这种乐观主义相反,小说刻画了人类在研究索拉里斯星大洋时从知识到行动的苍白无力,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它隐晦地使我们怀疑自己的科学和理性是否真如我们设想的那么理所当然,使我们反思我们对一切非我族类所秉持的那种所谓的“和平”意图,是不是像我们对大洋发射超强X射线那样,其本质在于排他性。

其次是人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小说中所设置的两组人物对立是科学家和F形体(即大洋),从本质上说,F形体是大洋窃取了科学家们的记忆丑闻所制造出来的类人形体。这个情节的原型恐怕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神话,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肋骨造出了夏娃。小说这一情节与始祖神话中的结构要素一一对应,大洋有可能是上帝,但太空站却不可能是个伊甸园——那些崇尚理性代表真理的科学家们在面对非理性的F形体时躲的躲、疯的疯、死的死,科学失效,理性告急,人类在太空站上演了一出滑稽的闹剧。它使我们认识到,在面对人类文明的绝对他者时,人类知识和人类想象是有终点的,人类社会的法则并不像其自身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无边无际的普适性。

第三是语言学难题,这表现为人类的语言系统在描述和研究大洋时的全面失效。在人类观察

者的眼中,大洋的拟态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然而当凯尔文想对大洋活动进行话语再现时,却发现人类语言系统当中根本不存在恰当的形容词。因此他不得不生造了许多单词来进行描绘,又同时在话语描绘的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与此相反,大洋能够窃取深藏在人类无意识深处的记忆秘密,却完全无视那些通过文字、图表和语言描述所形成的人类实验计划。这种尖锐的对立形成了强有力的反讽,直接否定了人类语言的有效性。

上述三组矛盾或说障碍都造成了某种叙事上的挫折和失败,却由此凸显出一种特殊的疏离作用。它将人类置于一种无法解决的结构困境之中,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对于他性的“认知”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解,这种认知无论是作为个体性的创造性力量,还是作为人类经历的总和的集体性历史(詹姆逊,《政治无意识》280),都被迫暴露出一种不可预见的终极的无力,包括知识的、理性的、语言的和想象的无力。如此,人类自信的虚弱体质就从其对立面取消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知识/权力、科学/理性的真理性地位,否定了人类/科学中心主义的普适性,那么小说是如何成功地在叙事中掩盖掉这种意识形态本质的呢?

## 二、“双重书写”:作为一种形式策略

### 1. 何谓“双重书写”(double inscription)?

在文本中,莱姆借格拉腾斯特罗姆之口提出以下论点:“人类与任何一种非人类的‘沟通’都是不可能的,与任何一种人类之外的文明的‘沟通’都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就考虑都不要考虑”(莱姆 263)。这种认为绝对的不同和差异之间无法沟通的科学哲学观,直接决定了故事的道德伦理取向和讽喻性特质。但乌托邦实施即文本叙事反而从这一观点的对立面写起,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人类借助科学来探索外星文明的未来时空中,将情节编织为一部人类科学胜利史或外太空征服史。这显然与文本意旨相左,是文本的表层叙事。而乌托邦体裁就被潜藏在这表层情节之下,形成一股逆向暗流,来解构和批判文本的表层结构,达到“不可知论”的终极意旨,这就是所谓“双重书写”的形式策略。

从此角度切入文本,如果说《索拉里斯星》是一部侦探式科幻小说,那它的叙述者凯尔文就是

侦探,故事架构可简化为侦探破案过程:凯尔文在经历多重探险后,最终解密并形成相对完整的“真实”叙述。这个叙述似乎无限地接近真相,以至于它被自然地等同于真相,被确立或者说被假定确立为事实本身。按照“双重写作”的形式策略,在这里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不是离奇的案件、曲折的侦破过程或真相本身,而是作者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案件,居然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一个完整的本体论以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是这个具有极度差异性的系统使我们可以与乌托邦想像发生联系”(“未来考古学”140)。

有趣的是,在小说中这种乌托邦想象的建构并不是依靠拟换物的排列组合来实现的,而是首先显现为一种体裁上的拼贴结构。因为伴随着吉巴里安死亡事件一起出现和发展的,还有对大洋本质构成的探索、与海若的爱情纠葛等等,它们错综地掺杂交合在一起,取消了那种以探索发现为主、以解决问题为终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体裁上为小说设置了数个阅读顿点。这种连续性的中断可以视作乌托邦体裁的局限性所在,但是承认其局限性并不等于否定它的有效性,相反,小说在其“双重创作”的两个层面上都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讽喻意味。当科学家已经制造出湮灭机来制服大洋时,凯尔文却大反其道,提出一个反讽性的问题:“海若还能再次出现吗?”而整个发现过程则提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当确认了外星生命与人类之间存在极端差异之后,无视这种差异是否可能?如果我们不能再回归到那种原初的天真状态,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差异,不论它是这种外星文明所具有的差异还是乌托邦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未来考古学”141)?

### 2. 乌托邦体裁的局限性

第一个问题在文本表层结构中的位置非常突出,它使小说得以进入科幻爱情故事的行列并打破了人类科学的预期:即人类与非人的外星生命之间不可能产生真诚的情感交流与心灵依赖。然而凯尔文和海若的爱情故事并非乌托邦体裁的全部,后者在它的每一个新的部分都设计了一种不同的小说或叙事,因此更像是不同文学体裁的特殊组合。这种组合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能够补充各种不完美的文学体裁,但另一方面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或阻碍它们(“未来考古学”343)。于是新鲜的体裁性期待被源源不断地生

产出来,它们中的每一个由于得不到满足而被中断,继而又被其他看似毫无联系的新期待所代替。在这种不连续的运动中,读者借以认识人物的诸种范畴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使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缩短或疏远,并合力为基本的故事情节变道。

从《索拉里斯学家》到《思想家》这十章里,穿插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连续性不断被各类阅读打断,这种阅读所占的篇幅近百页之多,对整个真相的揭示意义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叙事模式倒过来看——各种各样的事件镶嵌在主人公对《索拉里斯星史》(共13页)、《索拉里斯年鉴》第一卷(共4页)、《伪经指要》(共16页)、《索拉里斯研究十年》(共23页)还有图书室里其他史料的阅读(共18页)之中。这种纯文献的材料堆砌得越多,真相就向我们开放得越坦诚,而人类科学那种理性的、计划的却恐惧变化的特质也暴露得越彻底,这恰与下文中大洋的游戏的、非理性的本质形成了一组极具反讽色彩的矛盾对立。

而主人公和海若之间的情感纠葛,又使我们产生了新的罗曼蒂克爱情小说的阅读期待。海若拥有不死之躯,却表出极其受制的行动力,它对凯尔文莫名地具有神经质般的依赖,一旦分开就有可能导致某种因愿望无法满足所引发的愤怒,继而造成摧毁性的影响,比如徒手把合金门拉成两半。最令人震惊的是海若还拥有人类的情感和逻辑思维,在《液态氧》一章中,它因为自我认知的困扰而选择自杀,更确证了它具有人的伦理情感和自由意志,这正是人与F形体之间的爱情之所以可能的基础。爱情促使凯尔文第一次把大洋放在了与人平等的地位上来思考伦理性的问题,整部小说讨论的领域于是由外部引入内部,由物质引向精神,由表面深入内里。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F形体作为大洋与人的交流中介究竟代表什么呢?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人类与大洋之间的交流被证明是没有结果的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凯尔文的等待是否有意义呢?

小说在它最后的具体化中,似乎又回到太空历险记体裁中,它的硬科学在这场与绝对他者的拉锯战中爆发出强大的威力,“他想惩罚它,惩罚大洋,他想把大洋折腾得嗷嗷直叫,让这些山一样的形体都露出真面目”(莱姆287)。但主人公凯尔文却在这一系列暴政中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他连续做噩梦,试图通过“移情”这种非理性

的方式来理解大洋,甚至任凭自己沉溺于家庭生活来逃避非正义的太空事务。因为他越来越了解到,所谓“科学”,不过是在太空历险的面具之下潜藏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暴政逻辑,它不惜任何代价,将伯尔顿和吉巴里安推向精神崩溃的悲剧,发动了针对大洋的暴力和对海若的谋杀等——它真正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扫除异己、实现独裁。

而与人类的极度焦虑相反,大洋无动于衷地处于它自己永恒不变的游戏之中,对人类的存在和进攻几乎毫无回应,它非但不是那种所谓处心积虑的高智能异形,反而是人类不可能到达之物:它是“万千形态之祖,是绝望之深的种芽,也许它充满活力的童趣远远胜过它的智能”(莱姆309)。在这种反差之中,人类关于大洋他者具有威胁性的苦心营造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误解,一个显而易见的笑话。小说结尾,凯尔文对地球萎顿生活的悲观考量和对索拉里斯星大洋生命的崇高敬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一个伪太空探险故事演变为对一种根本性的乌托邦伦理问题的哲学探究:人类与绝对他者的交往是可能的吗?它在什么程度上是善意的?这种交往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吗?这也就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并接受与人类存在根本不同的外星生命?那么我们将如何想象乌托邦呢?

至此,我们又回到小说叙事的原则性策略问题上来了。文本“双重书写”策略是通过体裁的断裂性即不连续性来实现的,这是经典科幻文本对互相矛盾的叙事要素之间所进行的调和和贯通,它使文本不可遏止地呈现为一种自我指涉性,能在其内部来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自身的意志,于是乌托邦体裁的局限性就转化为一种极具张力的讽喻性和批判性。而在旧体裁被打断、新体裁的接续中,读者的体裁性期待被迫不断更换,文本于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机能,成功掩护了那些关于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发生隐秘的转向,使我们能在人类中心主义所假设的总体性系统的内部对其进行驳斥。这里所体现的双重性策略似乎更接近哈琴意义上的那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解决方法,即理论在其所反对的对象之中来确立自身:先公开承认自己与之串通一气,再通过戏仿和反讽在其内部将整个制度、概念或价值观问题化,指引我们认识到一统化体系和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界限、概念、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缺憾。“在某种程度上,问

题化行为就是一种帮助那些被人忽视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恢复其相关性的行为”(Hutcheon 229)。但《索拉里斯星》文本显然承担了更重大的理论主题,它不仅将这种本质上的“人为性”问题化,还进一步将乌托邦想象也问题化了。索拉里斯星的文本寓言所要揭示出来的不是一个更加全面的乌托邦,而是揭示我们在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的无力。“或者说,它揭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乌托邦的现在,既没有历史性也没有将来性,揭示我们被困在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制度中”(詹姆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380-81)。

### 三、莱姆的怀疑论:乌托邦是可能的吗?

当然,上述那种体裁的不连续性并不能完全概括《索拉里斯星》的情节结构,因为文本叙事要素的每一个部分都“将自己最新的体裁结构投射在重新架构的长期过程中”(“未来考古学”391),共同构成了索拉里斯星寓言。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所有的叙事要素都可以归结为一对“同位复现”的对立性范畴,即主体性的人类与他性的大洋之间持续的斗争与对抗。但这个对立建构成立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拥有对大洋的基本认知。这个预设与“不可知论”的总体命题之间显然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体现在文本中就是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能性。因为无论是关于“他者”的概念误用、“零度乌托邦”想象的无力,还是主体性的被搁置,所有这些未来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一种从其外部现实强力渗入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根本性的渗透中,退化的、失败的和被解构的不是占据主体性地位的人类,也不是最后可能被全部摧毁的他性大洋,而是整个乌托邦想象的世界及其想象本身(“未来考古学”485)。这样一来,文本表面的那种主体性与他性的对立建构就被判定为一种无意义,因为即使是这种只有最低限度需求的“零度乌托邦”的想象,也是一个已经被现实原则所污染的幻想,它无法逃离意识形态的现实力场,而最具辩证意味的恰恰在于,这种想象的原始动力源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抗。

#### 1. 关于“他者”的概念误用

在小说中,所有针对索拉里斯星的研究和辩论表明,人类对大洋的判断缺乏认知上的可参照

物,甚至对于二者之间可能关系的判断或描述,也无法使用“自我与他者”或“朋友与敌人”这样的相对概念。因为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地球哲学谱系里,他者是作为主体的参照物而存在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萨特,都关注他者对于主体自我意识形成的本体论意义,并且都认为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冲突而非对话。这说明人类在外太空的探险实际上是一种纳西索斯式的自恋行为,与其说是为了接触外星文明的和平目的,不如说是出于确认或者说确证自身的普适性的需要:“无论如何,这种行星是某种十分罕见的行星,与我们的地球不太像。我们,我们是普世的,一切都应该像我们这样,我们自以为是宇宙之草,我们要把我们的普适之草播撒到全宇宙,我们的想法是,宇宙的所有地方都要采用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就是基于这种模式才勇敢而又兴奋地奔赴远方的:看,另一个世界!”(莱姆 246)。

如果说大洋在其直观上作为异形他者能够轻易地模糊差异,成功掩盖这种本质上的人类主体中心主义的话,那当大洋的标本海若造访太空站时,这种对相对性范畴的借用就显得更加根据不足了。因为无论外貌、言行、记忆、情感,甚至伦理判断,人类自矜为己独有的珍贵特质同样为F形体所有。不仅如此,它还拥有再生性功能,能够永葆青春之躯——它甚至是更优化的人类!如果把它们识别为“他者”,那么为了保持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就必然以压制、奴役或消灭作为“他者”的F形体为代价。然而所有实验显示F形体是不死的,这意味着大洋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绝对异形,它溢出了传统的“他者”概念,对它的认知也超出人类的哲学范畴。这个事实彻底瓦解了我们的认知自信,它给人类带来的厄运是自我毁灭性的,这就是吉巴里安选择自杀的真实原因。

而一旦我们将大洋构建为认知意义上的他者,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原初的天真状态,我们做不到无视这个被命名的“他者”,“将它丢到某个如同未来自身一样密封得毫无缝隙的完全隔离状态中,甚至丢到我们称为乌托邦的截然不同的系统中”(“未来考古学”141)。我们的自我保护机制自然地就会将它改造为一种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异端,结果就是对“他者”的奴役甚至是摧毁性的影响。故事末尾,科学家成功制造出湮灭机来瓦解海若的中微子结构,可故事还远远没完结。

沿此思路继续前进,人类还必须消灭一切有可能重新恢复这种威胁的根源,所以作者没写出来的结局是大洋被彻底摧毁——索拉里斯星历史的终结之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又一次虚拟胜利。这里至关重要的道德对立被颠倒过来了:人类在索拉里斯星太空站的特殊经历直接建构了大洋与人类这样对立的双方,“每一方即使不要求一种控制权,也主张一种利益(将这个理解问题本身当作福柯的权利或知识的一个例子)”(“未来考古学”158)。除此,我们还有必要在整个乌托邦计划层次上对这一极端的他性形式做进一步考察。

## 2. “零度乌托邦”的现实力场

莱姆对大洋的设定是最经济的乌托邦想象,是阿多诺意义上的“零度乌托邦”理想。这个伦理理想无疑是反讽性的,它保持了最低限度的乌托邦需求,“像善良的动物那样生活(to try to live so that one may believe himself to have been a good animal)”,<sup>③</sup>也就假设了一种纯粹存在的想象状态。在这里,人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消失无踪,如同动物般处于“一种除去了所有我们对于生存的恐惧和对于未来的焦虑,以及无穷无尽的战术战略上的斗争和忧虑或恐慌的生活”(“未来考古学”234)。它自觉剥离出社会历史语境,与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拉开了绝对的差距,在一个想象的真空展示出乌托邦想象两个针锋相对的特质:既承担了人类不劳永逸的愿望,又表现为欲望的丧失。

这里的逻辑矛盾显而易见。首先我们不可避免地囿于詹姆逊所谓“情境性”当中,不可能脱离阶级、种族、历史的现实力场来绝对独立地展开想象,因此这种想象的真空及其承诺必然是虚构的产物,它不仅不是现实存在之物,且连存在的可能性也值得怀疑。其次正如詹姆逊提醒我们的,投入在乌托邦计划的每一个选择上的乌托邦冲动都具真实性,“它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寓言性的:它不是对应于某个计划或乌托邦实践,它是在表达乌托邦欲望并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经过伪装的、隐蔽性的、歪曲性的方式将它投资出去”(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554)。“零度乌托邦”想象所具有的这种矛盾性,恰恰证明了即使是对最低限度的乌托邦需求的探究,也根本无法逃离意识形态的现实力场,这正是莱姆怀疑主义的理论起点。

小说中唯一的可变量大洋是一种未知的存在,前文我们讨论过,它对人类的入侵及科学探测

活动毫无戒心,即使遭受到致命性的强X射线袭击,它也没有任何直接可见的应激性反应。这样一来,关于大洋的本质的问题,就转变为人类与大洋这两套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系统之间彼此沟通的可能性的问题。于是F形体作为大洋的标本被引入,成为这两个封闭的宇宙空间实现直面沟通的一个中介,直接推动了文本叙事。以海若为代表,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在它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它的基本模型就是从凯尔文记忆库里取下的一根“记忆肋骨”,索拉里斯星太空站的孤岛式设计屏蔽了其他现实参照物的干扰,使得它能够选择记忆库里最完美的要素来实现自我目的。而海若又是无目的的,或者说它的目的就是成为它自身,一个对爱人忠贞依恋的少女,情感细腻而真挚,连最后的自杀选择也是出于爱情的缘故。总而言之,它实现了人对身体、爱情和生命永恒性的一切幻想,这其中包含的任何一种愿望的满足都是根据人的自身利益,以及基于自我利益建构出来的社会习惯来给出的。

然而讽刺的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带来的恐怖感。用苏恩文的话来说,所有的F形体都是被大洋的魔法召唤复活的人类内心深处最黑暗隐秘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它们是随时出没的“虎”(tyger),像显微镜一样放大了人的狰狞、丑陋、愚蠢和羞耻,<sup>④</sup>击溃了人的理性防线,将太空站里的三名科学家推入精神崩溃的悬崖,造成了伦理悲剧。这种人类科学梦寐以求的直接交流,居然变成了他们最恐怖的厄运!而且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方式成功赶走了“这一个”F形体,在不久之后便又会有“另一个”重复自身、重新来过,科学家们就这样始终处于想象与恐惧的死循环之中,最后不得不通过摧毁F形体来实现自我拯救。讽刺的是,摧毁了F形体也就是摧毁了“零度乌托邦”的现实对应物,地球现实以各种或具体或抽象的方式渗透并消解了整个乌托邦想象本身。这里莱姆又一次确证了自己怀疑论立场,即极端差异的他性是不可知的,我们的历史存在经验全面地覆盖了所有的可能的想象,在这种同一化的运作思维中,任何关于他性的想象都被牢牢地拴在现实意识形态的力场之中,“没有什么比我们试图在新思想中逃离自己的情境,比设想对于我们来说最遥远最不同的东西,更具有意识形态性和自我限制性”(“未来考古学”229)。

### 3. 被悬置的主体性

这种关于对立性的谎言和人类对大洋所采取的摧毁性计划一样,是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建构堕入一种纳西索斯式的病态自恋的结果,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对一切“他性”进行歪曲思考或天真幻想的结果,它在伦理上必然显现为一种“无知和错误的最危险的形式”(“未来考古学”159)。正基于此,詹姆逊把大洋和人类的关系比拟为拉康意义上的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大洋作为一种具有绝对差异的他性,完全地站在所谓科学知识系统的对立面,揭开了它虚假的普适性面具;而另一方面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个他性的大洋却朝着人类的方向发展,制造出以人类为模版的F形体,后者甚至与真正的人类产生了情感联系,这恰恰为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摒弃。因此这种主体性本身也是一种寓言式的悖论,莱姆对它做了一种特殊的悬置处理。

首先,索拉里斯孤星这一科幻设定保证了一种特殊的外部稳定性,使太空站里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情境性尤其是政治性分离,而在其内部,人类存在也被极端简化。太空站里,清一色是男性科学家,他们对于食物和性的本能需求被降低到一个微乎其微的水平;面对地球与大洋的巨大时间隔阂,他们不顾直观经验的强烈对撞,努力在太空站内部维持已失效的地球时间;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那些在直观上和人类有同样主体性特征的F形体。从技术层面看,现有科学手段无法推进对大洋本质的发现,它们无非是更加确证F形体直观上的人类形式及其本质上的非人性而已。所以太空站内所有的机器人都被废除了,若没有人的因素,科学将变成一种自我消解性的消极力量。可一旦加入了人的因素,科学就反过来成为一股巨大的压制力,最突出的表征莫过于百年索拉里斯星研究史料,它虽然伪装成一种承诺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科学之思(“未来考古学”224),但其本质是一套具有总体性的科学话语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秩序,它必然要将伯尔顿报告那样的个体性意外排斥出局。再者,即使凯尔文能够将海若带回到地球,也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因为地球的群体性生活根本不能容纳这种非常态的、甚至极端的个体性。因此,上述所有事件实际上就是对整个地球社会缺乏个体性的控诉,这种现实性的直接渗入揭开了索拉里斯星史的伪

科学面具,暴露出其背后更实质的意识形态运作。

这种主体性也即詹姆逊意义上的“政治无意识”,它脱胎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模式,揭示了主体性内部的不可能性:它宣称除非个别主体能够“完全意识到他或她的阶级决定,并能够借助纯粹澄明和思想摄取来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意识形态制约”,否则它将永远消弭于巨大的集体性或总体性的力场之中(《政治无意识》280)。这等于直接宣判主体性无期徒刑,因为个体永远是社会中的个体,它将无法摆脱它的“情境性”,即总体意识形态的羁绊与监禁(“未来考古学”228)。在这种一与多的辩证法中,乌托邦对未来性的想象最深层的主体,即我们的历史性当下就全面暴露出来了。乌托邦想象就被还原为现实世界的孪生子,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文学对应物,至此,文本的寓言性结构的最后一环也被拆解了。

当然,“费米悖论”仍然悬而未决,索拉里斯星和大洋不过是莱姆的科幻设定而已,对它们所进行的悬置过程只能是一种思想实验,认知哲学在其中通过政治寓言的方式发挥作用,即隐藏了那种“将特殊的政治体系建立在生物学本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企图(“未来考古学”226)。综合来说,整个乌托邦写作也是一种思想实验,在乌托邦的蓝图叙事之下,“双重书写”策略发挥了最大限度的隐蔽性功能,它将对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的书写,伪装成一种关于未来的通俗叙事,所取得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因为现实性因素的不断渗入,整个梦想世界或幻觉状态正在褪色、退化、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历史性的当下,这恰是乌托邦所幻想的未来的过去。如此,乌托邦对未来的想象最终被全面性的意识形态压力解构,即使这种想象的原始动力恰恰源于对后者的批判和反抗。反抗的最终结果也许只能是无能为力,乌托邦想象也注定将被意识形态肢解。

因此乌托邦是无意义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在布洛赫的意义上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an “upgrading” of the utopian)的话,那么它“在可能性的意义上”就显现为一种“尚未”(not yet),即只有我们为它做一什么,它才可能存在(Bloch 2)。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改变某些只存在于当下的现象的效价(valences),才有可能建构一个乌托邦的未来。而历史本质上是非叙述的,它只能通过文本化和叙



事化为我们所理解(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148),这样,文本形式或者说乌托邦叙事就变成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是历史向我们显现的唯一途径。有了这个前提,这种未来阐释学才显现出它的政治功能:像激活久而不用因而已经萎缩了的肌肉和器官一样,(在这里主要是指那些“进行政治、历史以及社会想象的器官”)(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579),重新激活那种历史性——通过拆除叙事的寓言性结构,同时捕捉乌托邦残留物的踪迹,来显露出意识形态对乌托邦想象的阻挠、遏制、裹挟、擦抹和囚桎,并使得历史作为一种必然性的结果向我们的当下敞开。因此这种乌托邦想象的价值在于,它本身“既不是一种政治规划也不是一种政治实践:但是,如果没有它,也很难看到任何长久的或有效的政治行动可能出现”(《辩证法的效价》579)。在关于未来性的讨论中,莱姆式解决方案同样包含了这样一份永不破灭的乌托邦信念:“回应我的期待的,是圆满?还是又一场玩笑?还是新的痛苦?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死死咬定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种种残忍的奇迹频仍的时代还没有过去”(莱姆 319)。

#### 注释[Notes]

- ① 参阅【加】达科·苏恩文著,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舒伟译审,《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史学和文学类型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具体论述为:“科幻小说总是将古修辞学对‘不可能之事物’(impossibilia)的比喻与同样古老的关于希望之国的理念融合在一起”。
- ② 本文选用译本为【波兰】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著,陈春文译,《索拉里斯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以下文章多处引文皆出于此书,不复赘注。
- ③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Y: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299. 詹姆逊的详细论述见于《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第228-43页。
- ④ 【加】达科·苏恩文著,郝琳、李庆涛、程佳译,《科幻小说面面观》(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255页。关于“僮”的解释见该页注释②。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orno, Theodor W.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 Bloch, Ernst.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Trans. Jack Zipes and Frank Mecklenbur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8.
- Hutcheon, L. *A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8.
-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 [Jameson, Fred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Trans. Wu J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 :《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Collected Works of F. Jameson, Vol. 3: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Ed. Wang Fengzh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Ed. Zhang Xudong. Trans. Chen Chunqiao,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Trans. Wang Fengzhen and Chen Yongguo.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9.]
- :《辩证法的效价》,余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 [——.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Yu L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4.]
-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索拉里斯星》,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Lem, Stanislaw. *Solaris*. Trans. Chen Chunw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史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舒伟译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
- [Suvin, Darko.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Trans. Ding Suping, Li Jingmin and Li Jingying.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 [——.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Trans. Hao Lin, Li Qingtao and Cheng Jia.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责任编辑:王峰)